

中国文学

谈蓓芳 著

古今演变论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文学 古今演变论考

谈蓓芳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谈蓓芳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6

ISBN 7-5325-4527-X

I. 中... II. 谈...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1124 号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

谈蓓芳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5 字数 300,000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5325-4527-X

I·1892 定价: 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序

贾植芳

蓓芳虽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我却没有给他们年级开过课,在她念书时并不认识她。毕业后她留在学校的古籍研究所工作,与我女儿桂英成了同事,常来我家里,就很熟了。

她研究古代文学,也研究现代文学,对西方哲学很感兴趣。我看她英文不错,就建议她翻译 Daniel Halévy 的 *The Life of Friedrich Nietzsche*,以便她加深对尼采的理解,也作为对英文的加强训练。她译得很认真,译笔也不坏;但译成是在 1986 年,当时出版这类书不容易,找了几家出版社都不行。有的编辑想出,但最终还是不行。所以我帮她拿到台湾的业强出版社出版,收在一种丛书里,中译本名《尼采传》;出版后反响很好。可惜限于丛书的体例,出版时作了删节。过了几年,才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全译本《尼采传》,出版后印了好几次。

从那以来,二十年过去了。在这期间,她除了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并翻译了王靖宇教授的《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外,更多的时间则从事于中国文

学的总体性研究。现在她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论考》将要出版了,希望我给她写篇序,我想就其中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说些意见。

她的这些论文都很有特色。其基本思路是从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来观察、研究现代文学,因而往往能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不曾留意之处;又因为不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人,处境较为超脱,有时倒反而能较早地说出行内的若干研究者的同感。这也就是她的这些论文的价值所在。

在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她所最看重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联系问题。无论是对胡适、陈独秀的提倡文学革命,鲁迅的《狂人日记》;还是一度成为现当代文学指导思想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她都努力寻求其与古代文学之间的联系并加以阐发。从她的这些论文来看,它们的作用不只在阐述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积极影响,而且更在于说明其消极的一面以及现代文学的成就和特色。例如,关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她认为这本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学指导思想,古代之把文学作为教化、讽喻、美刺的工具,实质上也就是要文学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所以,在上世纪40年代以降的一段很长的时期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之被普遍接受(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不仅是由于其源自政治的权威,而且更由于其在民族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的基础(见《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的影响——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再如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周作人早就指出了这一“革命”与晚明公安派等文学思潮之间的联系,但那是从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积极影响而说的,而她则在承认这种积极影响的同时更看到了这一“革命”

的局限与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联系(见《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至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以“人吃人”来概括“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她也并不认为是与中国文学传统截然对立的新见,并从以前的中国文学中寻得了它的历史渊源;不过,她不是以此来贬低鲁迅的创造性,而是想准确地究明其创造性的被忽略的一面——在文学的形式上的创造,而且她认为这跟中国文学研究中长期忽视形式的重要性的风气有关。诸如此类的研讨,都是在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中来考察现代文学所获得的成果,具有显而易见的原创性。

在她的论文中,有两篇是谈现、当代文学的分期的。她认为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是当代文学的开始,那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文学阶段已经结束了。这曾经引起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较为热烈的讨论,至今仍无定论。这是一场严肃、认真而且很有益的学术讨论。在丁帆教授的一篇相关论文中有如下的话:“其实,有许多学者都持有谈蓓芳教授那样的观点:‘80年代文学是向“五四”新文学传统回归的时代,从90年代起则将成为逐渐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产生距离的时代,但这距离绝不意味着背弃“五四”新文学已有的成就,而是在这成就的基础上朝着符合文学本身特征的方向走上更新的阶段。’说穿了,也就是‘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语境逼使中国文学在重回‘五四’母题的历史过程中,走进了已被‘标准化’过了的现代与后现代的文化语境。”[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二期]这也就是我在上文所说的“因为不是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人,处境较为超脱,有时倒反而能较早地说出行内的若干研究者的同感”的一个例证。因为,把这种意见发表出来并引起现代文学研究界颇为热烈的讨论的,恰恰是她

这个并非单纯研究现代文学的研究者。

总之,本书所收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虽然篇数不多,但都很有分量。她年龄还轻,我希望今后能看到她这方面更多的研究成果。

序

章培恒

谈蓓芳教授收在这部论文集中的论文,发表最早的是《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与《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都发表在1989年。最晚的则是发表于今年的《〈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和《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从1989年到2006年的十七年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收在集子里的这十八篇,数量不可谓多,但质量之高却使我很为钦佩。

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宣告的,谈蓓芳教授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并且兼顾“论”、“考”两个方面。上举的四篇论文的题目就正显示了这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其研究的深度。每篇都具有见解新颖,思维敏锐、缜密,论据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学识渊博——的长处,何况其研究面又如此广阔!就此论之,十七年间在承担教学和本职的科研工作之余,能发表这样的十八篇论文,真是谈何容易!

现在就以上文提及的这四篇论文中的三篇来看一看她的研究深度;因为有一篇在贾植芳师的《序》中已经论及,没有

必要再在这里多说了。

《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对长期被贬低乃至否定的二萧的文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作了高度的评价。当然,以前也有极少数研究者肯定过二萧的文学思想,但却不曾作过深入的阐发,例如已故朱东润师就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分别评二萧之说为“真近代论文所称浪漫之极致”、“直抉文艺之奥府”,那固然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唯限于该书体例,未曾作进一步的论证;至于二萧的文学创作,其所受到的冷遇和蔑视更甚于其文论。所以,像此文那样地从文学的性质和中国文学的演进着眼来考察二萧的文学思想,以艺术感染力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新变为视角来考察二萧的诗歌创作,并对之作具体而深入的剖析,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地抉发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和贡献的,实为前此所未见。何况它发表于1989年,文中的观点在当时是算极其出格的。证据是:我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对魏晋、南朝文学作了若干肯定,较此文还要谨慎得多,却已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位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商榷》中说:“这是章文对六朝唯美文学的高度赞扬,也是结合当代新观念——自我表现——所作的结论。研究古代文学史是为了今天和明天。难怪这几年来诗歌、小说的创作总是强调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文学理论界也大力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反对现实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一概说之为庸俗社会学。文学创作既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自然也就是不必要的了。”原来,在那个年头“赞扬”“六朝唯美文学”

是可以被视为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要写《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这样的文章，不仅需要识力，也需要胆力。

上举三篇中还有一篇也是涉及六朝文学的，那就是《〈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假如说上一篇以理论的分析见长（当然也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这一篇就是纯考证的文章了。至迟从明末以来，学术界在《玉台新咏》版本问题上的认识就处于“治丝愈紊”的状态，把一种本就残缺不全、又经过明末人篡改的《玉台新咏》版本——赵均刻本——当作了最接近此书原貌的、最忠实可靠的本子，不仅否定了保存在《玉台新咏》其他版本中的为原书所有的诗篇，而且根据此本来考证《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赵均刻本卷末有南宋人陈玉父所写的《后序》，研究者就认为其出于南宋陈玉父刊本，可信度极高；同时，此本所收萧纲诗均署名“皇太子”，研究者又认为这是此本还保留着徐陵编《玉台新咏》时的原始面貌的铁证——因为一般认为《玉台新咏》是萧纲为皇太子时所编。而在《〈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及其于上一年发表的《〈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中，谈蓓芳教授则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赵均刻本的底本原无陈玉父后序，这是赵均从其他本子中窃取过来、拼凑上去的。而且她还发现了北宋前期晏殊所编《类要》中既引了《玉台新咏》的“梁简文”（萧纲的谥号）诗，又引了《玉台新咏》所收的“皇太子”诗，不过“皇太子”诗不是萧纲的作品而是萧统所作；据此她又进一步指出：北宋人所见的《玉台新咏》是既收“梁简文”萧纲的诗，又收有“皇太子”萧

统的诗的,不过不称他们的姓名,只分别称为“梁简文”、“皇太子”;而且,该书在收同一作者的若干篇诗时,一般只在第一首下署作者,以下几首就都不署,只要原署于第一首下的作者姓名佚失,这位作者的所有的诗就都成了排列于其上的另一位作者的诗了,而“梁简文”诗是收在“皇太子”诗之后的,所以在赵均刻本的底本中只有“皇太子”诗而无梁简文诗,只是因为佚失了原列于“皇太子”以后的诗篇的作者署名——梁简文——而已。就这样,她不但有力地证明了长期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玉台新咏》赵均刻本之不可靠,而且同样有力地证明了《玉台新咏》编成于萧纲死后——否则怎么会称他的谥号?

这实在是《玉台新咏》研究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不仅解决了《玉台新咏》的版本问题,更引发了对《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重新思考,并且在我看来还必将引发对此书编者问题的怀疑——《玉台新咏》长期被认为是徐陵受萧纲之命所编,现在既已知道《玉台新咏》编纂时萧纲已经死去,其时徐陵已在暮年,又已经过了改朝换代——梁亡陈兴——的大变化,徐陵为什么还要编这部“艳歌”——徐陵《玉台新咏序》中语——集呢?当然,这是就此文的结论而说的;若就其考证的功力而言,那么,其掌握材料的全面,观察的细致、深入,思维的敏锐、缜密,都已臻于上乘。记得陈建华博士在回忆其于1979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时的情况说:“那时复旦中文系的风气崇尚实学,有朱东润、蒋天枢、陈子展等老先生,都恢复带学生,于是旧学光复,赳赳然极一时之盛,虽然现在看来也像是夕阳烂漫。”(《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后记》)其最后一句虽然颇有些伤感的意

味,说的却是事实。谈蓓芳教授也是1979年进入复旦中文系的,不过当时还是本科生,陈建华博士则是研究生;她的这类考证,正是经历了那种“旧学光复,赳赳然极一时之盛”的风气的熏陶的结果。

上举三篇中的另一篇《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的研究对象虽是明代文学,迥异于前两篇之以六朝文学为研究对象,但也同样富于创见。最重要的在于:一、发现了从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发展到袁宏道“性灵说”的桥梁——屠隆的文学主张;二、揭示了袁宏道前、后期“性灵说”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转变的时间。这既进一步阐明了李梦阳复古运动的进步意义及其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的联系,也深刻地剖析了袁宏道“性灵说”的复杂内涵,对理解明代文学从中期到后期的演化及其内在脉络都很有贡献。

总之,谈蓓芳教授所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因而着重于宏观的思考,其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都以这一目标为中心。张业松副教授在评述她对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评价及其在这基础上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的论断时说:“谈教授的论文^①明显建基于一部囊括有史以来迄于当前的中国文学通史的写作过程中的具体断代处理,存在一种将20世纪以来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的迫切感;……”(《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见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00)我想,这是说得很好的。而且,她的非考证的论文都具有将其研究对象“有机整

① 指谈蓓芳《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已收入本书。

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的热切意图,考证性论文则是为这一意图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她之将其研究对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是植基于扎实的实证性的微观研究的,因而不尚空论,言必有据。这也就是这部论文集的价值所在。

我的序文写到这里就算结束了,下面再作一点题外的交代。这部论文集中有两篇曾经算是我与她合写的,实际上却由她为主撰成;动笔以前并未就如何撰写作过讨论,写出来后我也只是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只因为原是我建议合写的,所以她仍坚持由两人共同署名发表,而且我署名在前。后来我在辑集自己的论文时,从未收这两篇;在她的这部论文集中则自应将它们收入。故特为说明如上。

目 录

序.....	贾植芳	1
序.....	章培恒	1
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		1
《玉台新咏》选录标准所体现的女性特色		19
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 ...		33
袁宏道“性灵说”剖析		54
龚自珍与 20 世纪的文学革命.....		70
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		87
中国 20 世纪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的影响		
——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		104
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		
别一种理解		145
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		168
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		190
再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		212
《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		232
《玉台新咏》版本补考		268
也谈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兼及《水浒传》版本中的		
其他问题		295

试谈海内外汉籍善本的缀合研究——以李贽评本	
《忠义水浒传》为中心	362
关于《水浒传》的郭武定本和李卓吾评本	379
《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为吴吴山所撰考	398
脂评本《石头记》是否后人伪造——评《〈红楼梦〉	
“两大版本系统”说辨疑》	413
后记	429

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

——以萧纲、萧绎为中心

自唐代以来,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文学潮流一直受到指责。唐初所修《隋书》的《文学传序》对齐代和梁初的文学虽有好评,但对梁代后期的文学却颇肆挹伐,并且把萧纲、萧绎作为罪魁祸首。这以后,对齐、梁文学的评价越来越低,施予二萧的抨击也就日益严厉。然而,这一文学潮流真该受到这样的指责么?这种指责的依据又是什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此作进一步的探讨,实在很有必要。

—

这一文学潮流具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萧纲、萧绎的如下意见: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

* 原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五期。此次收入,已略有修改。

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萧绎《金楼子·立言》）

比较起来，萧纲所说的“文章且须放荡”是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原则。然而，由于古今语异，现代有不少研究者对于“放荡”一词存在着误解，似乎那是一种很要不得的东西。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氏在《南朝文学放荡论的美意识》一文中^①，引用了以下几个实例：

指意放荡，颇复诙谐。（《汉书·东方朔传》）

物皆自用，则孰是孰非哉？故虽放荡之变，屈奇之异，曲而从之。（《庄子·齐物论》郭象注）

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使放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名士传》）

从这些实例来看，当时所谓的“放荡”，与今天所说“生活放荡”的“放荡”是有区别的，与“淫荡”当然更不是一回事。林田氏说，这些例子中的“放荡”“都含有放任的意义，在用于精神的场合，则应解作放任感情”。我想，他的解释是对的。如再参以齐高帝对萧晔的一首“学谢灵运体”的诗歌的评价——“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②，当更能明白“放荡”还有不为作品形制上的常规所束缚之意。

从汉代起，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给文学加上了种种

① 见日本《东方学》第27辑。

② 《武陵昭王晔传》，见《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卷三十五。